



VI HORAE

吴震 著


# 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

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

When Chinese Confucianism Encounters Japan

## 儒学东传日本，经历了怎样“日本化”“再日本化”？

西学东渐，西学的“中国化”既是实践问题又是理论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VI HORAE

# 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

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

吴震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吴震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675-3773-6

I. ①当… II. ①吴… III. ①儒家-研究-日本 IV. ①B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7550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六点评论

## 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

——19 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

著 者 吴 震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4.75  
字 数 7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773-6/B · 956  
定 价 35.00 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关注中国问题  
重铸中国故事

## 缘 起

在思想史上，“犹太人”一直作为一个“问题”横贯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人们众多问题的思考线索。在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突显的“中国人”也已成为一个“问题”，摆在世界面前，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崛起强盛，这个问题将日趋突出、尖锐。无论你有什么立场，这是未来几代人必须承受且重负的。究其因，简言之：中国人站起来了！

百年来，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切肤经验，使我们许多人确信一个“普世神话”：中国“东亚病夫”的身子骨只能从西方的“药铺”抓药，方可自信长大成人。于是，我们在技术进步中选择了“被奴役”，我们在绝对的娱乐化中接受“民主”，我们在大众的唾沫中享受“自由”。今日乃是技术图景之世

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我们站起来的身子结实了,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

中国有个神话,叫《西游记》。说的是师徒四人,历尽劫波,赴西天“取经”之事。这个神话的“微言大义”:取经不易,一路上,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取真经更难,征途中,真真假假,迷惑不绝。当下之中国实乃在“取经”之途,正所谓“敢问路在何方”?

取“经”自然为了念“经”,念经当然为了修成“正果”。问题是:我们渴望修成的“正果”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经”?从哪里“取经”?取什么“经”?念什么“经”?这自然攸关我们这个国家崛起之旅、我们这个民族复兴之路。

清理、辨析我们的思想食谱,在纷繁的思想光谱中,寻找中国人的“底色”,重铸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六点评论”旨趣所在。

点 点

2011.8.10

## 内容摘要

儒学东传,经过一番“日本化”改造而融入日本文化传统当中,从而形成日本的儒学(儒教),回溯历史,这项改造工程大致从17世纪初江户时代就已全面启动,这是当今学界的一般通识。在明治维新(1868)以后的近代日本,儒学遭遇了“日本化”与“近代化”的双重夹击,它被作为“东洋伦理”或“日本道德”的代表,或被化作帝国意识形态下的“国民道德论”,被用来提升全民精神文明,实现“臣民一体”、“道德齐一”,以为由此便可抵御西方精神污染,进而实现“近代超克”直至“解放亚洲”,在此特殊的年代,儒教遭遇了“再日本化”的命运。战后日本,“儒教”名声一落千丈,人们在对“近代日本儒教”猛烈批判之同时,也开始对儒教日本化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省思,人们发现在日本化背后存在着“日本性”问题,亦即“日本化”得以可能的日本自身文化传

统究竟何在的问题,丸山真男晚年的“原型”论致力于探寻“日本性”,便与此问题意识密切相关。但是在当今日本,儒学日本化的进程已然中断,其原因是否由于日本已经彻底“西化”抑或已经退缩至“原型”则已非本文所能深究。但可肯定的是,对于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各种西学的“中国化”既是实践问题又是理论问题。

**关键词:**儒学、儒教、日本化、近代化、近代超克、原型论、日本性、中国化

**Abstract:** It is a common sense that from the Edo Period in 17 century, Chinese Confucianism spread to the east to Japan where it undergone localization and integrated to Japa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Japan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Confucianism met with loc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treat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Japan Ethics or Japan Morality or National Moral Theory in imperial ideology that was used to promote people's spirit and unite people and morality so as to protect Japan from western spirit to liberate Asia. Confucianism encountered re-localization in Japan in this context. After the war, Confucianism became bad in Japan. Scholars started to introspect the loc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while criticizing it badly. They found that behind the loc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s the Japaneseness, which is the Japanese culture



that makes the localization possible. The theory of Prototype from Masao Maruyama in his late life explored the Japaneseness, which is relevant to this question. However, at that time,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suspended and the reason whether Japan was getting westernized or it drew back to the Prototype is not the point this article reviews. However, for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t is certain that the localization of all kinds of western thoughts in China is the problems of practice and theory.

**Key Words:** Confucianism, the loc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modernization, overcoming modernity, Theory of Prototype, Japaneseness, sinicization

- 1 前言  
Preface
- 6 一 “儒教日本化”之言说的出现及其背景  
One: The Appearance and its Background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 
- 19 二 “近代化”与“日本化”的双重夹击  
Two: Attacks from Modernization and Japanization
- 
- 41 三 “日本道德论”到“国民道德论”  
Three: Japanese Morality and National Moral Theory
- 
- 59 四 “近代超克论”与“道德生命力”  
Four: Overcoming Modernity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Vitality of Morality
- 
- 80 五 丸山真男有关“日本性”问题的思考  
Five: Masao Maruyama's thoughts on Japaneseness
- 
- 106 六 当代学界有关“儒教日本化”的考察  
Six: The Review of the Japa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Modern Academic Circles
- 
- 121 七 余论:从“日本化”想到“中国化”  
Seven: Other Conclusions: Sinicization in this Context
- 
- 130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前 言

如果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算起,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就已启动,然而人们意识到在理论上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在一个世纪之后即进入了 21 世纪才由官方正式提出,至于各种外来思潮(例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是否也有必要或者“中国化”或者“再普遍化”或者干脆“拒之门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则仍在不断探索乃至争吵。与此同时,在“中国化”问题的背后,存在一些更为重要而又互为缠绕的需要追问和解答的问题:我们究竟应当或可以利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使“中国化”得以可能?而“中国化”是否应当在“多元文化”的立场上才能展开?或者索性关起门来即便出现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之现象亦不为异?这里面涉及衡量“中国化”的判断标准及实施策略又是什么等问题,

目前似乎尚在摸索途中。

再看中国的另一边,日本接受儒学的历史甚早,约始于公元5世纪,然而真正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开始启动“日本化”却在17世纪进入德川朝以后,形成了所谓“德川儒学”,只是明确提出“儒教日本化”这一概念则已是19世纪末(首次出现于1893年)。及至20世纪初帝国日本期间,儒学遭遇了“再日本化”的命运,在帝国意识形态的操作下,形成了所谓“近代日本儒教”,致力于推动全民道德“齐一化”(丸山真男语)运动——国民道德运动。显然,“中国化”与“日本化”的问题背景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化”字背后蕴含着某种民族文化的自信却多少有点相似,因为“中国化”也好“日本化”也罢,其主旋律在于突出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或“反模仿”西方(江户时代,中国相对于日本便是西方)或将西方“个案化”,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历史上看,17世纪江户时代以降,在儒学日本化的同时,儒学也面临着被重新诠释、批判解构乃至被重组,由此产生两个互相连带的后果:一是增强了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意识,一是日本文化的自觉意识得以提升。例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古学派对儒家形上学、国学派对整个汉学的批判解构便极大地提升了儒学日本化的进程。及至19世纪末明治维新以后,儒教面临着“近代化”和“日本化”的双重冲击,事情就变得有些复杂:保守主义者以为儒学传统的道德主义可以作为抵御西潮的资源而加以利用,自由主义者则将儒学看作近代化的死敌、

亚洲停滞的宿因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不管怎么说,直到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之前,儒教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它几经改头换面,甚至一时充当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工具。

二战以后,战前国家意识形态受到猛烈批判,人们将“近代日本儒教”与“日本精神论”、“日本道德论”视作一丘之貉而加以唾弃,于是儒学仅被视作一种研究的历史对象,再也没有在理论或实践上重提“日本化”。渡边浩宣告自明治维新后,儒学就开始了“自杀”的进程,<sup>①</sup>这并非是耸人听闻之词。的确,在近代伊始,一方面儒学扮演了引进西学的角色,在幕末维新之初,一些儒者在“天下公共之理”这一新儒学的信念下,坦然接受西潮思想,然而另一方面,在与西学的激烈竞争中,儒学终于败下阵来而落得个“自杀”的结局。<sup>②</sup>

---

① 渡边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以为19世纪末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在推动“振兴皇基”、“王政复古”之革命的同时,思想界也发生了“儒学西洋化”的革命。维新以降,儒学渐被“西洋思想”所吸收,而儒学自身作为“体系”的思想生命力却迅速丧失。“至少就日本而言,儒学对于引进源自西洋的‘近代’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然而同时又意味着自杀”〔渡边浩:《西洋の“近代”と儒学》,载沟口雄三等编:《汉字文化圈の歴史と未来》,东京:大修馆,1992年,第132页;后收入渡边浩:《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东亚的王权与思想》),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9页)。

② 如庆应四年(1868)三月日本新政府提出的一项“国是”中就提到“须基于天地之公道”来应对外来冲击,这显然汲取了“天下公共之理”这一新儒学的观念,而这项“国是”的原型则是源自幕末儒学家横井小楠(1809—1869)的《国是三論》(关于小楠,后面会有涉及)。不过,在西潮冲击下,儒教的命运虽然不妙,但是在明治昭和年间,儒教也有多次反弹。正如渡边浩所言,儒教“自杀”不过是“一个方面”,若将日本近代思想史看作西学彻底战胜儒教的过程来描述,便不免受“进步史观”之牵制而有单纯化的危险。

在当下中国，“日本”是个敏感词，将其纳入学术话语展开讨论变得很难，因为一不小心便会被人质疑话语背后有何另外的动机。另一方面，“儒学”与“国学”正在连手，大有文化传统开始复苏之象，令人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人们急于寻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那个迷惘彷徨而又令人激动的年代。然而“东亚儒学”的研究状况却不容乐观。数年前笔者撰文曾乐观地估计近十年来在“汉语学界”悄然兴起的“东亚儒学”的研究热潮，<sup>①</sup>现在看来，所谓“汉语学界”仍限于台湾一地，而在大陆，与儒学研究正高歌猛进的走势相反，东亚儒学研究却少有问津。个中原因非一言所能尽，既与当下东亚出现的“新冷战”局势有关，也与历史上的“大中华意识”变身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民族主义等姿态在大陆学界仍时常作怪之现象不无关联。

按理说，在当今世界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理应可以努力做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重新审视儒学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至少对于改善“东亚儒学”在大陆的研究态势或有推动作用。但是现在问题很多，何谓“东

---

<sup>①</sup> 《“东亚儒学”刍议——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为核心》，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3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9月，第345—405页（按，该文未经我校对，误植甚多，不堪卒读）。另参拙文：《试说“东亚儒学”何以必要》，刊于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8卷第1期（总第15期），2011年6月，第299—318页；该文的简体字版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57—66页，并恢复了子标题“从子安宣邦、黄俊杰的相关论述谈起”。

亚”、“东亚儒学”何以可能又何以必要等问题,仍然难以找到共识。笔者曾就“东亚”一词的文化历史涵义以及东亚儒学的研究性质、对象及其方法途径等问题有过初浅的探讨以及展望,此不必复述。我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东亚儒学是多元性学术研究领域,而非政治学意义上争取话语霸权的场所,是将儒学在东亚的传播、接触、交流等历史作为一面借镜,来探讨儒学思想资源在未来的方向性及可能性,从根本上说,当今东亚儒学研究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一环。<sup>①</sup>至于东亚儒学的未来发展如何可能等问题,显然与当下东亚社会的诸多现实性问题密切相关,就目前看,对这类问题下任何判断仅有“预言”性质,似不必多言。

本文主要涉及两大问题领域:一、19世纪末在加速“近代化”,逐渐走向“帝国化”的近代日本期间,为对抗西潮、同时也为强化思想统治,儒教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二、及至战后日本在反省帝国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思想灾难之际,又是如何审视儒教“日本化”何以可能以及日本传统文化的“日本性”问题?当然,在探讨过程中,也将针对有关“儒教日本化”之现象背后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必要的省察,最后,我们将对“中国化”问题以及儒家文化问题谈几句感想。

---

<sup>①</sup> 参见上揭拙文:《试说“东亚儒学”何以必要》,第316页。另参拙文:《德川日本心学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兼谈“儒学日本化”》,载《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2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9—176页。

## 一 “儒教日本化”之言说的 出现及其背景

其实，“日本化”一词之本义很简单，如同佛教传入中国而有“中国化”之现象，也如同中国佛教传入日本而有“日本化”现象一般，所谓“儒学日本化”也无非是指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之后出现的一种接受而转化之现象，其结果是日本儒教的形成。<sup>①</sup>

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用语，“日本佛教”几乎无人质疑，相对而言，人们往往具体地说“江户儒教”、“德川儒教”或“近代日本儒教”，而“日本儒教”之说法则并不常见，因为此说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似有一个贯通整个古今日本历史的“日本儒教”之实体，其自身以种种历史姿态来展开，这就与如何判断儒教在日本文化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有关。显

---

<sup>①</sup> 关于“儒学”与“儒教”的名称，与大陆包括台湾学界惯称“儒学”相比，日本学界常用“儒教”一词，意指作为教化体制的儒学思想。本文一般不加区分。



然这一问题不是本文论旨所能承担的任务,本文仅在儒教“日本化”这一宽泛意义上,使用“日本儒教”,具体指17世纪以降的近世日本,以及1868年至1945年的近代日本,至于中世以前及近代以后,儒教在日本社会文化中是否占据核心地位,在我看来是颇为可疑的,特别是把当代日本社会说成是“儒家资本主义”或将日本文化归属于“儒教文化圈”,<sup>①</sup>则完全是一种想象而已,若在当今“东亚儒学”研究中,仍把日本视作“儒教国家”则应慎之再慎。

## 1. 德富苏峰：“儒教日本化”的提出

不待说,“儒教日本化”显然是一个后设的概念,最初是用来考察江户儒学的一种设定。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儒教日本化”作为学术用语,最早可能是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民权论”者及民族主义者德富苏峰

---

<sup>①</sup> 关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儒教文化圈”之说,其实丸山真男早在1984年就明确表明了反对意见,他断然指出:“若要說日本属于儒教文化圈,无论如何是不能这么说的。”参见其文《原型·古層·執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についての私の歩み》,载《日本文化のかくれた形》,东京:岩波书店,2004年“岩波现代文库”本,第131页(按,初版于1984年)。至于其判断理由,这里不能细述,若一言以蔽之,丸山认为日本文化与李氏朝鲜全盘接受儒教的“并吞型文化”不同,属于“漏斗性文化”——意即对外来文化不断过滤筛选并加以修正的“修正主义文化”。其对李氏朝鲜文化类型的判断可以商榷,而其对日本文化之特质的判断则值得重视,因为所谓“修正主义”,指的就是不断“日本化”的过程。